

经济形势
调控措施
政策取向

JING JI ZHONG GUO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看法

白 和 金

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在外界普遍把中国经济视为稳定和复兴亚洲经济乃至稳定世界经济的希望之时，一部分人对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势也不无担忧。

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内是否还要和能够保持近 20 年来年均 10% 左右的高速增长？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会大幅度下滑？对此，国内外歧见颇多。

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中国经济仍可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因素，除已具备的政治前提外，主要是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高水平的储蓄率。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不大可能也不宜去追求前 20 年那种 10% 左右的高速度，但也不致于大幅度滑坡。

体制因素：中国的改革已由打破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制度创新阶段。破旧相对容易，由此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已基本释放出来；立新则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渐进过程，近期内还难以造就推动经济增长加速的体制条件。

供求因素：经济增长是需求和供给双向拉动、相互转化的结果。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几乎不存在需求约束；改革前以强制

积”方式形成的重工业基础和某些基础设施（如水利工程）为迅速增加解决温饱所需要的供给能力准备了物质条件现已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机制明显强化；原有的供给能力虽然规模不小，但结构性矛盾突出，很不适应居民消费向小康转型带来的整个需求层次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以产业升级和提高素质为目标的结构调整，较之过去以数量平面扩张来填补短缺的结构调整，难度更大

国际因素：八九十年代，是世界经济相对稳定和快速增长期，国际市场容量迅速扩大，我国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出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引进外资，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容放慢：即使不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已趋于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原经互会国家相继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外贸出口也难以在原有结构层次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吸引外资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调整和新的探索阶段。

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国内专家和实际工作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本世纪 90 年代，年均增长 8%~9%，最多不超过 10%；下世纪头 10 年年均增长 7%左右。1979~1997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 9.8%，其中前 10 年为 9.3%。实践证明，连续几年超过 10% 的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明显的通货膨胀；而像治理整顿期间那样的低速增长，则会出现大面积的市场疲软。“八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高达 12%，因此“九五”只要年均增长 8%，整个 90 年代的年均增长速度就是 10%。而 1996 年、1997 年的速度分别是 9.6% 和 8.8%，后 3 年只要年均增长 7.2% 即可实现 90 年代年均增长 10%。1997 年的经济增

长速度与许多专家年初的预测相反，比 1996 年不是上升而是继续平稳回落。这并非由于宏观政策过紧，而是由于前述多种因素，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已在悄然变化。“九五”后 3 年，应是由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年均近 10% 的高速增长向下世纪初年均 7% 左右的适度快速增长的过渡阶段。从国际比较看，7% 也是高速度，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高一倍多，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但全国上下已习惯于多年来 9%~10% 的高速增长，而且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海外投资者的信心危机，使 1998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 8% 成为人们的一道心理防线。因此我们要力争 1998 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8%，但前提是不搞积压产品，不搞盲目重复建设。

只要我们主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和资源供给的潜力，实现 1998 年经济增长 8% 是可能做到的。对此，要注意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与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关系。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表里。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把财政、货币适度从紧由短期政策上升为促进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中期政策，目的是要在巩固经济“软着陆”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为推进“两个转变”营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保持必要的市场压力。“从紧”冠以“适度”本来就内含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政策意图。“从紧”的“度”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灵活地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本改变适度从紧的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是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必要灵活性的统一。二是扩大有效需求与增加有效供给的关系。要通过深化改革（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要素市场来突破实现有效需求的体制、政策障碍，通过结构调整形成新的有效供给能力来创造新的需求。三是扩大投资需求与增加消费需求的关系。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放慢，收入差距较大和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即期消

费增长平稳，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是适当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但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应能最终转化为消费（包括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而不是增加库存积压或只能在投资品工业中自我循环。否则扩大投资需求只会带来中间需求的非正常增加和社会再生产运动的梗阻，由此拉动的经济增长既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多少实惠，也不可能持久。四是扩大国内市场与开拓国际市场的关系。国内市场潜力巨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无论深化城市市场开发和开拓农村市场都大有可为。同时，必须大力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力争外贸出口稳定增长。这不仅是发挥国内生产能力、增加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而且因为外资企业已广泛进入我国国内市场竞争，内资企业如不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最终也将在国内市场竞争中败北。

“九五”后 3 年扩大投资的重点是：增加农林水利建设投入，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按照全国统一规划加快东西向铁路和西部地区铁路网建设，对主要客运干线实施提速改造，在繁忙路段发展客运专线，加快国道主干线高速公路建设；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普通居民住宅建设规模 加快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道路交通、供水供热供暖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建设；加大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力度，支持市场前景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加快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增加环境保护投入，积极发展环保产业。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不出现明显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标志之一。“九五”后 3 年，从改革攻坚对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以及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要求看，在促进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同时继续保持低通胀，是十分必要的，从各方面条件看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一般而言，市场价格总水平的走向反映通货的松紧。但就中

国的现实情况看，需要具体分析。目前价格总水平已处，负增长状态，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能货过度紧缩，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的表现 1997年，广义货币M2增长 17.13% 狭义货币 M 1增长 16.5% . 现金流通量M0增长 15.6%。均比GDP名义增长率高出6个百分点以上，且M0和M1占M2的比重上升，表明货币流动性增强，企业和居民当期支付能力提高。1998年中央

银又采取一系列增强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能力的措施，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利率。春节前现金净投放高达3198亿元。现实中存在的银行“惜贷”和企业“慎贷”现象，反映出金融风险意识的增强和新一轮结构调整的难度，很难说是宏观调控上还在进一步紧缩通货。从价格结构看，主要是食品类和盲目重复建设严重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市场过度竞争的工业品价格下降，导致价格总水平的负增长，居住和服务价格涨幅较高。这从价格的角度反映出结构性矛盾对总量平衡关系的制约。

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害的。巩固近几年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果，防止出现明显反弹，应是“九五”后3年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鉴于90%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而由市场形成，政府定价的范围仅限于少数几种基础性产品、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价格，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政府多出台一些调价项目，而是要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和宏观调控体系，规范企业和各级政府的价格行为，以形成良好的价格秩序。对于仍须由政府管理的价格，确实不合理的还要适时加以调整，但出台调价措施一定要充分考虑到企业和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并把调价与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结合起来，不能是一有亏损或上项目缺资金就从提价上找出路。对垄断性行业的价格要加强监管。对已放开而由市场形成的价格，要指导、

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成本管理制度与自主定价规则，提高企业的价格决策水平，防止价格欺诈和不正当的价格竞争对在严重通货膨胀时实行的一些临时性的价格控制措施，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加以调整或取消，继续完善以间接手段为主的价格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的失业问题，已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实现在一定自然失业率基础上的充分就业，是西方经济学提出并为西方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之一。怎样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如何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选择。

中国的就业问题，由历史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由于 50 年代人口政策的失误和“文革”期间无政府状态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严重冲击，造成人口基数巨大。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以吸纳全部劳动力，由此决定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据专家和有关部门估计，改革之初约有 2.5 亿人。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相比的。三是由于长期以来用“低工资、高就业”的办法把城镇劳动力就业包下来，形成了国有企业包括相当一部分城镇集体企业的大量冗员，至少有 2000 多万人。现在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加之必须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职工下岗和再就业问题就突出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三大压力总的看是在逐步消化。1979~1997 年，全国城乡新增就业岗位 29448 万个 年均 1550 万个 如此大规模地增加就业 这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近几年中国在有效抑制通胀过程中，避免了经济增长速度大起大落，1993~1997 年全国

成乡新村增就业岗位 4 0 4 6 万个。年均 809 万个其中 1997 年新增 7 5 0 万个。这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在治理通胀时就业规模绝对缩小形成鲜明对比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约 1.4 亿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自发流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已基本脱离农业，常年在城市从事相对稳定的工作城镇下岗职工，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推算，到 1997 年底累计在 1200 万人左右，其中 40% 已实现再就业，20% 无就业欲望，40% 正在寻找工作下岗人员增多，一方面使机制性、结构性失业问题浮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冗员的历史包袱正在卸下来。

尽管就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今后几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不可低估。一是 80 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迅速上升，1996 年已达 68.2% ，比改革前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而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高达 82.5% ，比改革前仅降低 0.2 个百分点。虽然劳动力增长高峰期现已过去，但巨大的人口基数使“九五”后 3 年每年新增经济活动人口仍高达 900 万人左右，其中城镇劳动力每年增加 300 万人左右。而经济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已发生变化，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去追求更高的速度。二是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的超常规、超高速增长已经结束，同城市企业一样正面临着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任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必然放慢。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要在 3 年左右实现“两个大多数”的目标 还将下岗 800~1000 万人 平均每年 300 万人左右，加上政府机构改革的人员分流和军队裁员，城镇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还会加大，特别是在那些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比重大的地区，矛盾尤为突出。

中国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不是经济景气波动的周期性失业，而是 50 年代中期以来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自身生产比例失

调（这个比例关系需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调整过来）形成的原发性失业，当前主要是在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中由隐蔽而显化的机制性、结构性失业简单搬用西方经济学的通胀、失业替代理论”，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的失业现象，更不能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应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出发，恰当把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分流实行再就业要积极稳妥地有步骤进行，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急于求成。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过调整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实现经济持续适度快速增长。在重点培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同时，重视发展中小企业和有市场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不断提高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由于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市场化、社会化水平不同，就业弹性系数会有很大的差别。近几年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从产业分布和所有制分布看，已是 70% 以上在第三产业和非国有经济单位，这一趋势今后还会发展。实施再就业工程，要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市场竞争就业机制结合起来，政府安置就业的重点应是尚不够退休年龄、但直接进入劳动市场又有客观困难的中年下岗职工。以外，还应实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和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以减轻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压力，为下岗职工留出再就业空间。

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与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加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覆盖全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为劳动者和社会构筑安全网，又可促进劳动力顺利流动 解决目前“隐形失业”与“隐形就业”并存的问题。鉴于今后几年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比较集中，可适当提高

失业保险金缴费率，并由企业单方面缴费改为企业和在职职工共同负担。在适当时候，可考虑将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收取的失业保险金、再就业基金等，改为统一征收社会保障税，并相应建立社会保险预算。

在亚洲出现金融危机时 中国明确宣布人民币不贬值 不仅是对香港的有力支持，也是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稳定的重大贡献。中国在 1994 年汇率并轨后，已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保持人民币稳定，基础在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已达到 1400 亿美元。这是中国敢于向全世界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资本”。但国际收支平衡中存在的隐患必须高度重视 防止一旦出现问题引起外汇储备下降，动摇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

扩大外贸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汇率的要求。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面临严峻的形势。对此，国家已采取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 2 个百分点、扩大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权、增加出口信贷等措施。但出口企业对国家财政支持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主要应立足于自强自救，内部挖潜 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降低成本、费用 强化国际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在努力保持出口价格竞争力的同时大力提高非价格竞争力。

1997 年我国外贸顺差达 403 亿美元。为减少贸易摩擦和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应在保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不是萎缩的前提下多增加一些进口，缩小贸易顺差。进一步下调关税税率，对先进技术设备进口实行免税优惠政策，人民币汇率坚挺，都有利于增加进口。但要注意三点：一是要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主要增加高新技术及设备 and 短缺资源进口，防止盲目过量进口一般商品和倾销、走私对我国内市场的冲击；二是要把缩小贸易

顺差与调整 国别贸易结构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我国与一些国家贸易顺差过大而与另些国家贸易逆差过大的状况：三是以进口带动出口并采取鼓励三资企业多使用国产原材料、零部件的政策

目前我国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比较合理，债务率、偿债率和短期外债比重均控制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之内，外商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加之资本项目尚未开放，近期内不会发生东南亚国家和韩国那样的偿债支付危机和外资抽逃问题。但“九五”期间是我国借用国外贷款的还本付息高峰期，近两年偿债量已大于借入量：近两年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协议下降幅度较大，1988年资本净流入有可能减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在资本项目的监控和管理方面，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存在的隐患。

彻底清理债务，消除隐性外债。韩国、印尼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刻教训是企业 and 金融机构对外举债隐匿不报，严重失控。我国外汇管理当局统计的短期外债与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数据之间的差距，表明我国也存在隐性外债问题。因此，对我国国内企业、海外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外债务，特别是到期外债和隐性外债必须抓紧进行彻底清理，重新登记。一是对于未经国家批准和非法的境外融资、提供固定回报率的假合资真举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外担保以及外资企业借用的外债等，都要摸清底数。对到期外债 要按照谁借、谁用、谁还的原则负责偿还 不能用国家储备外汇垫付。二是保持外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清理对外借债窗口，调整或关闭不符合条件的外债窗口。三是加强资本收支监管，防止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汇和非法逃汇套汇等违法行为。四是积极探索吸引外商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新方式，并加以规范和加强监管。选择一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和集团

与国外的跨国企业合作、合资，促进我国中小企业与国外拥有专利技术的中小企业合作、合资。力争今后几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继续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亚洲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和科技进步的趋势，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实质经济就会缺乏新的增长点，企业经营也会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当今货币经济运动严重游离于实质经济运动的条件下，如果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过松，极易形成“泡沫经济”从而为爆发金融危机种下祸根。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凡是宏观经济政策比较稳健和经济结构比较健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遭受的损失就相对较小，反之就损失巨大。我国由于较早地认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危害性，及时采取坚决措施抑制和消除一度出现的房地产投资过热和股市过度投机现象，坚决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以加强农业和缓解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瓶颈”制约为重点的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因而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得以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但我国前一段形成的某些经济泡沫的后遗症并未完全解决，金融不良资产比例较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远未完成。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坚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不可分割。目前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总量平衡关系的巩固和进一步改善，而近几年总量平衡状况的好转又为加快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和条件。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扩大内需作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是完全必要的，这应以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为前提，并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效益和素质密切结合起来。

在市场经济中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是维护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正常的经济秩序，也需要用适当的经济政策去引导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除在非常时期和个别特殊领域外，不能去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代替市场配置资源。金融机构既要按市场经济原则独立运作，自主经营，又必须有严格的监管。企业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不能依赖政府的保护和金融机构的“输血”。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政府将全面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体制和政府机构三大改革作为重要任务 确定了 3 年到位的目标。这是我国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为防范金融风险构造最重要的制度条件。

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既给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给各国经济 and 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国际风险。尤其是投机性很强的大规模国际私人资本在全球迅速流动，金融衍生工具空前发展，导致货币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对各国的金融调控和监管能力以及国际金融体系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外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我们决不会由于亚洲出现金融危机而放慢对外开放的步伐。亚洲金融危机也表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和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在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更要十分注意趋利避害，尤其是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必须与自身的监管能力相适应，做到既积极又稳妥。

（本文作者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取向

林 兆 木

一、全面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经济发展实现“软着陆”，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8.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 0.8%。1998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7.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 1.5%。无论从我国历史看，还是从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实现“高增长、低通胀”，都是不容易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但是这个期间也出现过“高增长、高通胀”和“低通胀、低增长”的情况。例如，1987、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11.6% 和 11.3%，而物价指数也上升到 18.5%（1988年）和 17.8%（1989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度上涨，从 1988年第4季度开始实行治理整顿，压缩投资，控制需求，1990年和 1991年物价指数分别降到 2.1% 和 2.9%，但经济增长速度也由 1988年的 11.3% 跌到 1989年的 4.1% 和 1990年的 3.8%。又如，1992年到 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 14.2%、13.5% 和 12.6%；而同期物价指数也上升到 13.2%（1993年）、21.7%（1994年）和

14.8%(1995年)由于中央从1993年下半年实行加强宏观调控的一系列措施,以及随后进行了宏观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才使国民经济发展在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物价涨幅回落到6.1%。1997年以来进一步巩固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

第二,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瓶颈”制约明显缓解。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加快,在我国已初步形成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买方市场。农业连续3年丰收,1997年在北方地区遭受严重旱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达到9850亿斤,肉类、蛋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也都有大幅度增产。农副产品市场供应充裕,价格基本稳定。工业生产稳步增长,1997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1.1%,能源、原材料工业和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发展迅速,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明显缓解。钢铁、煤炭等重要生产资料库存充裕,粮食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国内贸易部对613种重要商品的调查分析,其中供过于求的占31.8%,供求平衡的占66.6%,供不应求的只占1.6%。我国经济总体上摆脱了短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财政、金融形势平稳,货币供应量增长适度。1997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3%,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10.4%,财政赤字560亿元,比预算目标减少10亿元。社会资金供求关系较为宽松,1997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上年末增长18.6%,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46280亿元,比上年增长19.3%。各项贷款余额增长16.7%。年末现金流通量(M0)为10178亿元,增长15.6%;狭义货币(M1)增长16.5%;广义货币(M2)增长17.3%。国家银行贷款规模和现金投放量的增长适度,基本上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

第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状况良好。1997年进

出口总额达到 3251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2.1% 其中出口总额 1827 亿美元,增长 20.9% 进口总额 142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5%。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403 亿美元。我国进出口贸易在世界各国的排位,由第 11 位上升到第 10 位。1998 年一季度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 12.8% 进口增长 2.6% 贸易顺差 105.3 亿美元。1997 年实际利用外资 640 亿美元 增长 15.7%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453 亿美元 增长 8.5%。1998 年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到位 86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7%。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截至 1998 年 3 月底,达到 1406 亿美元,比上年年初增加 356 亿美元。由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债的规模和结构比较合理,金融市场尚未开放,因而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为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扩大作出了贡献。

在好的经济形势下,也存在忧的方面。当前突出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一部分企业生产不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积压问题仍然突出。1997 年末,全国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 5921 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1.7%。企业亏损问题仍然严重。1997 年末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达 1341 亿元,比上年末上升 11.1%,其中国有企业亏损 744 亿元,上升 8.2%。1997 年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由 1995 年的 33.6%,1996 年的 21%,下降到 18%。预计 1998 年将继续回落。

第二,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压力加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7 年末全国国有企业共有下岗职工 1274 万人,其中已分流 640 万人(占 50.2%) 还有 634 万人需要再就业,加上集体企业下岗职工 364 万人,现在全国需要分流的下岗职工共有 998 万人。预计 1998 年还将新增下岗职工 300 万人左右,连同

城镇登记失业的人员，失业率有所上升，就业、再就业的问题突出，对社会稳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

第三，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较突出。供给结构的调整仍然明显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前几年房地产业过热和盲目重复建设遗留的大量问题还没有消化和解决。1997年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增幅下降，投资技术含量减少，原材料和加工工业等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进展较慢，而超过市场需要的高档房地产等建设项目，有些地方还在盲目上马。这是当前许多商品滞销、经济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

第四，金融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新形势的要求，金融法制不健全，监管薄弱，乱设金融机构和违法违规的问题相当严重，潜在的金融风险加大。

第五，农业基础脆弱、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以上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也有的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要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二、确保 1998 年 8% 的经济增长速度

由于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国际上普遍关注中国经济的动向，主要是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我国政府已经一再宣布，人民币不贬值，1998年要实现经济增长 8%。1998年保持 8% 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历史经验证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党的十四大提出 90 年代年均增长 8%~9%， “九五” 计划提出年均增长 8%，都是比较合适的增长速度。速度过高，经济过热，就会诱发通货膨胀和价格持续上涨，造成经济社会的不稳定；速度过低，不利于充分发挥资源的潜力，并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